

# “逐自由而居”： 新媒体语境下评论社群的话语建构

陈敏 刘雨祺

## 摘要

本文从“阐释社群”这一理论出发，对2015年底多家媒体推出的年度新闻评论评选及其颁奖辞、评论策划，以及部分知名评论员在个人微信公众号撰写的年终总结等文本展开分析，探讨评论员群体在“热点时刻”的阐释实践：他们是如何理解评论空间与言论表达之间的矛盾，又是如何建构移动新媒体平台上的评论标准，以及在强化身份认同、建构评论员共同体时，使用了怎样的话语策略，又存在怎样的价值分野。

## 关键词

评论员、阐释社群、热点时刻

## 作者简介

陈敏，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博士。电邮：cmw226@163.com。

刘雨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2013级本科生。电邮：415872553@qq.com。

本文受到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桐山基金项目（编号：54500001），以及中山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16300009）的资助。

## “Pursuit of Freedom”: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in Chinese Commentator Communit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CHEN Min, LIU Yuqi

##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y”, this study analyzes several news organizations’ annual review awards and awarding citation, comment planning, and some well-known commentators’ summaries on their Wechat accounts by the end of 2015. The study explores commentators’ interpretive practices, aiming to figure out how they interpre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peech restriction and free speech, how they established review criteria on mobile media platform, and the discourse strategies they used, the value divisions they had during

strengthening identities and constructed communities.

### Keywords

commentator, interpretive community, hot moment

### Authors

Chen Min is a Ph.D. and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cmw226@163.com.

Liu Yuqi i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415872553@qq.com.

This article is sponsored by the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Fund of Tong Shan fund for Young Scholars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oject NO. 54500001), and the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oject NO. 16300009).

和很多记者在告别传媒业时因一篇离职告白搅动舆论场、引起关注不同,评论员的离职变动往往较少受到关注,这一方面因为评论员的数量在全部媒体人中的比例较小,多家媒体评论部的人员规模都在10人以下<sup>1</sup>;另一方面,评论员的供稿模式相对灵活,即使离开某家媒体机构,也依然可以为各媒体平台撰写评论,不像记者转型那么“彻底”,往往也就不需要专门写一篇离职告白。回顾过去一年的新闻评论界,评论员的流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主动辞职离开媒体,如评论员程仕才(笔名西坡)、贾葭、马九器、曹旭刚、王冲、周虎城、张洁等;第二类,因言论不当而被动离职或因评论部被裁撤等原因待岗,如《兰州日报》评论特稿部编辑赵文,《三晋都市报》评论部主任周俊芳,《生活新报》评论员龙敏飞<sup>2</sup>等;第三类,换了媒体机构,但仍从事评论工作,如评论员魏英杰、十年砍柴、廖保平、杨耕身、王攀等;第四类,在原媒体机构内部发生岗位变动,如原《羊城晚报》评论深度部主任郭启钊、原《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编辑苏少鑫、《新京报》记者胡涵等。

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是,有些评论员即使没有变动工作,但心里也开始有了怀疑和动摇,这从几位评论员在2015年末的总结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sup>3</sup>:《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感慨,“以前从未怀疑过自己坚守传统媒体、坚守时事评论之路的决心,但今年一直在怀疑,怀疑从事这份职业的意义。有时感觉自己虽然身还在传统媒体,但心已经不在,脚已经跨出了一大半”;《北京青年报》评论员蔡方华称,“虽然也有几分成就感,但痛苦的撕扯、无休止的劳作和对前途的迷茫,仍然如影随形般纠缠着我”;《钱江晚报》评论员刘雪松则感叹,“在媒体从业20多年时间里从未寻思着改行的我,没有哪一年,更让我像2015的这一年一样,感到如此

无力，却又如此被需要认同、被支撑”。

那么，该如何理解评论员流动的现象？又该如何看待评论员袒露心迹的文章？可以从哪些维度去考察评论员群体在公共话语平台上的阐释和讨论？带着这些问题，本文拟从2015年多家媒体推出的年度新闻评论评选及其颁奖辞<sup>4</sup>、岁末年终的评论策划<sup>5</sup>，以及部分知名评论员在个人微信公众号撰写的年终总结、新号开张感言<sup>6</sup>等文本入手展开分析。

选取这些文本的依据主要是：第一，在年度优秀评论作品评选这样的“热点时刻”（hot moment），各媒体通过颁奖词、嘉宾点评、获奖感言等方式来阐释作品的获奖理由，树立专业标准，一定程度上是对自身的“加冕”，同时也是建构职业共同体最好的契机；第二，岁末年终媒体的评论策划和盘点，是对过去一年评论界总结的最好文本，分析评论员群体在公共话语平台的阐释实践，有助于了解话语背后的意涵以及评论员群体作为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的共同特征和内部差别。

### 一、关于“阐释社群”的研究文献回顾

“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这个概念由学者Stanley Fish在1980年提出，他认为，是“阐释社群”而不是文本或读者生产意义。阐释社群由共享阐释策略的人组成，这一概念有助于解释为何不同读者可以从一个文本中得出同样的意思，因为他们习得或内化了同样的阐释策略(Cornford, Wilson & Richardson, 2013; Marianne, 2000; Mitra, 2010)。

“阐释社群”理论根源于文学批评，现有研究主要将其用于文学作品的受众研究(Carleton, 1995; Hermes & Stello, 2000)，体育报道中的粉丝群体研究(Wenner, 1993)，另类媒体受众中的行动者研究(Rauch, 2007)，法官群体的建构、法律实践及法律判决制定的研究(Golden, 2008; Goldsmith, 1998; Marianne, 2000; Robel, 2001)，网络虚拟社区中同性恋博主“还击”主流媒体报道研究(Mitra, 2010)，以及关注在新的信息生态环境中，如何构建本地化的阐释社群，使之更好地利用政府开放数据，以服务于本地治理的需求(Cornford, Wilson & Richardson, 2013)。

对新闻业而言，“阐释社群”概念提供了分析记者如何定义自身的理论工具(Brewin, 1999)。Zelizer(1993)认为，仅从“职业”概念出发，已无法为分析美国记者群体提供更丰富的解释框架，需要将记者视为“阐释社群”，在这一群体中，记者们共享对一些关键公共事件的阐释话语。此后，国内外学者多将其应用于分析记者

群体的话语建构，但侧重点略有不同：

一是整体性地概述和讨论记者群体的阐释实践。Brewin(1999)探讨美国新闻界的公共新闻改革与记者阐释社群的关系，认为如果不检讨传统新闻模式的内在传播逻辑，公共新闻改革的变化将会非常有限。Berkowitz & TerKeurst(1999)反思了记者和信源之间的关系，认为地理意义上的社区，及社区中记者和人群的互动形塑了新闻的面貌。陈楚洁、袁梦倩(2014)引入“边界工作”的概念，审视新闻社群在面对新闻业的内部争议和外部挑战时如何诉诸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界定何为专业的新闻、记者及其行为，以此重塑其文化权威与合法性。金叶(2015)从新闻事实的叙述活动、新闻记者的角色功能、新闻组织结构和新闻专业机构等四个维度，研究社会化媒体语境下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困境与重构。

二是研究具体案例、“热点时刻”记者群体的阐释实践。Gutsche(2014)运用“精神地图”的方法来探究记者阐释社群是如何通过新闻为城市空间赋予意义的。白红义(2014)从江艺平退休这一“热点时刻”新闻人的纪念话语出发，研究新闻专业话语在互联网平台上的阐释和讨论，指出这可能预示了正在发育中的记者阐释社群的出现及阐释社群边界的拓展；丁方舟、韦路(2014)考察了2010—2014年间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变迁，发现新闻人借助“记者节”这一特殊历史时刻，不仅会分享职业理想与现实工作之间的矛盾，更会重申自身认为新闻人应该承担的规范性角色，从而共同建构话语基础上的阐释社群；丁方舟(2015)在其后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当代中国新闻社群话语体系中有两个核心话语：“理想”与“新媒体”，它们主导着当前中国新闻社群对自身及其职业的自我阐释与意义建构。张志安、甘晨(2014)从中国新闻界对于孙志刚案的集体记忆入手，发现由于体制、定位及价值等差异因素的存在，中国新闻界缺乏共同的集体记忆，真正具有“共同体”特征的新闻阐释社群尚未形成。

三是着重关注某一平台或介质在新闻人社群阐释性话语实践中的功能和作用。李红涛、黄顺铭(2014)通过对《南方传媒研究》上的“反思性书写”进行个案研究，分析专业期刊在新闻人建立诠释共同体过程中的作用；黄顺铭(2014)通过对普利策新闻奖颁奖词的研究，分析颁奖词的话语实践及社会功能，其中包括有助于新闻从业者形成自己的“诠释社群”的功能。

从上述基于“阐释社群”理论展开的研究中，可以总结出如下研究路径：通过对某些“热点时刻”或某一平台上记者群体的阐释实践进行话语分析，能够看出媒体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了新闻业，以及记者群体在面对这些变化的时候是

如何建构新的专业主义原则，维护自身权威的；此外，记者群体的阐释性话语实践本身，也被用于研究“共同体”的形成及记者群体内部的分歧。

而区别于以往研究侧重将“阐释社群”这个概念用于记者群体，本文更聚焦于研究其中的评论员群体，以此框架分析他们在评奖、岁末年终等“热点时刻”的话语实践，观察他们建构身份认同、树立专业权威的努力，以及在新媒体语境之下，对评论的专业标准、社会功能等方面的重新建构。

## 二、关于评论环境的叙事建构：管制与突破的动态博弈

首先检视叙事主体的基本职业特征。从红网、新浪网，再到新京报的年度评论评选，评委会组成都跨越了学界和业界，因此，其评选结果和颁奖词可以视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建构了有关评论的叙事话语。具体来看，红网的评委包括业界的曹林、刘洪波、童大焕、杨耕身、于德清、鄢烈山、郑根岭，以及学界的熊培云、魏剑美；新浪网的评委包括业界的冯雪梅、王爱军、杨耕身、陈季冰，以及学界的陈昌凤、马少华、马勇；新京报的外部评审专家包括学界的范以锦、徐泓、高钢、陈昌凤、吴飞、张树庭、展江，以及业界的陈菊红、白岩松。凤凰网的评委则全都来自学界，包括陈昌凤、杜骏飞、范以锦、马少华、石义彬、唐远清、吴飞、张涛甫、张志安、赵振宇。

其次，从话语建构的层次来看，文本叙事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即：关于评论本身的叙事，以及关于评论所处社会环境的叙事。考虑到评论员群体对言论环境一向非常敏感，对此的话语阐释往往占据了较多篇幅，本文先分析评论员群体对于环境的叙事建构。

在搜狐的十三篇年终评论策划中，萧锐、西坡、佘宗明、韩福东、朱达志、刘远举、木春山、杨耕身、陈季冰、蔡方华、刘雪松、曹林、江雪等十三位评论员分别撰文阐述了对过去一年评论界的观察。在谈及言论环境时，他们主要使用的词语是“逼仄”（韩福东、蔡方华）、“禁忌越来越多”（江雪），而这样的环境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自身的评论写作，比如曹林提到，“写了12年了，到我这个年龄，有了一些历练、积累和资历，本来应该更多更积极地介入时事热点的，但我选择了后撤。开始写风花雪月婆婆妈妈，写一些很‘安全’的社会话题，讨论一些无关痛痒的媒介和评论专业话题，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朱达志则提到了评论员在选题时的自我审查，“某些题材是永远碰不得的，某些题材是当下‘不合时宜’的，某些观点是不可能出笼的，某些主张是不能明说的，某些‘关键词’是提都不能提的——

尽管它们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言论环境的逼仄，媒体的评论奖项会特别突出和肯定那些突破话语禁区的文章。凤凰网在给2015年度十大评论之首的《公共问题敏感化遗害无穷》一文的颁奖词中就提到，“评论之道，在不躲话语禁区，不避敏感问题”；其作者廖保平获奖感言中也称，“禁区林立，如行沼泽，掌握策略，突破危险。这其实不是什么英勇无畏的壮举，是向常识日日拱卒，掉到河里也不是没有。但拱得多了，禁区的边界就缩小了，世界开阔了，阳光大块大块的照射进来”，“文章之能发表出来，又实是中国脱敏史的一个细小见证”。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一个话语策略是，评论员群体一方面埋怨言论空间的逼仄、褒奖突破话语禁区的勇敢，另一方面，也不忘肯定这种突破离不开管理者的包容，暗藏肯定与感激之意。这种矛盾和妥协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学界评委张涛甫的点评中：“在中国语境下从事评论写作，必然会遭遇表达的边界问题。硬碰硬去突破底线，踩红线，图一时是快，风险极大，也不可持续。好的评论须有智慧垫底的胆识，须有对表达尺度的精准拿捏与把握”。

进一步地，对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话语禁区突破的媒体平台和媒体人，评论员群体也不吝赞美，颇有抱团取暖之意。评委唐远清称，“在评论的选题和立论等方面，还不时会出现一些禁区，评论人还或多或少要承受‘戴着镣铐跳舞’的折磨。在这种环境下，新闻评论界要给受众提供更多的优秀评论作品，关键是要有一批有勇气、有胆识、有良知、敢于公开自主发声的评论作者，也要有一批敢于刊发这些评论作品的媒体。这是不可或缺的前提”。评委马少华在看了凤凰网的68篇备选评论作品之后，表示他“对这个社会的信心增强了”，因为“在这个言论的制度环境看起来并不令人乐观的历史时期，我还能够看到如此开阔的写作、深刻的认识、有力的表达，这不是进步，又是什么？”

不过，一年一度的评论奖项对个别突破话语禁区的评论文章的褒奖，只能算作评论生产中的“高光”时刻，相比之下，在日常的评论实践中，评论员群体更多地还是要受困于逼仄的言论环境。2015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知名评论品牌“媒体札记”选择了“无限期冬眠”，主动停掉。执笔人詹万承在告别文章中写道，“那触目惊心的‘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以及频繁出现的‘该微博已被删除’，常使人倍感无奈”，“我有点累了……可能还刚发十分钟，码了一天的字，就被卷入黑洞，消失不见了。”<sup>7</sup>

此外，萧锐、西坡、贾葭、佘宗明等评论员的微信公众号在2015年都经历了一



次或多次的被销号,这样的“热点时刻”也容易引发评论员群体对言论环境的感知评判。西坡在个人微信公众号被销号、新号开张时说,“在这个国度做一个批评者,官家不开心,平台不待见,正能量小将也看不惯”<sup>8</sup>,点出影响言论空间的三种主要力量,即官方、媒体机构和部分网友。这一分析与评论员余宗明的观点部分重合,“左是网络‘道德判官’们的围剿,右是老大哥的眼睛盯着,二者夹缝形成的促狭评论空间,让评论变得更像是螺狮壳里做道场。而时下的舆论气候,相当于给‘螺狮壳’开口贴上了封条”。

可以看出,在新媒体平台上,普通网友作为影响言论空间的一股新力量,也对评论员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能量小将”也好,“道德判官”也罢,网友的反馈比从前更容易抵达评论员那里,并影响其写作。评论员蔡方华提到,“自从做了新媒体之后,被人骂的机会多了起来,这也是比较新鲜的体验。以前在报纸上写评论,从来都不担心读者的反馈,反正也听不到。但现在,一切都来得太直接、太迅速,一语不合,后台就会收到大量痛快淋漓的留言。”但总的来说,评论员并未因此而放弃对话语禁区突破的努力,正如萧锐所说,“从微博到微信,言说将至,管制随行,公共表达的冲动逐自由而居”——这种“逐自由而居”的力量,就是管制与突破动态博弈的真实写照。

### 三、关于新媒体评论标准的叙事建构:时效、专业、表达、功能四个维度

#### (一) 追求评论的时效性,以速度PK尺度

回顾2014年新京报、凤凰网等媒体的评论奖作品,可发现仍以纸媒评论为主,彼时虽然微信公众号、APP等平台也生产了大量评论,但尚无缘奖项;而到了2015年,大量移动媒体端的评论作品开始斩获评论奖项。

比如,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沸腾”的文章《五问天津爆炸:被化工和恐慌围困的城市》同时获得了“新京报2015年度评论写作奖金奖”以及凤凰网“2015年度影响中国的十大评论”(之三),其中新京报的颁奖词一再强调该篇评论的发布节点:“好媒体会在最精准的时间节点对事件进行追问。《五问天津爆炸》在爆炸后5个小时发声,直指政府责任、信息披露等灾难事件的核心问题,振聋发聩”;凤凰网的颁奖词也肯定其“评论之快,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没有最快,只有更快”,二者都充分肯定这篇评论的时效性。

获得《北京青年报》年度总结暨2015总编辑特别奖之“2015年度言论奖”的,是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团结湖参考”的文章《你不反思,灾难就会替你反思》,颁

奖词称,“天津爆炸后的第一时间发声,阅读量达到30万以上,并为各大门户网站转载”。此外,凤凰网“2015年度影响中国的十大评论”之一《公共问题敏感化贻害无穷》和之十《庆安枪案,被维稳压倒的真相》分别首发于APP“无界新闻”和微信公众号“有难度”。

上述评奖结果显示出评论员群体已经认识到,新媒体平台上评论发表的时效性往往意味着更多的阅读量和更广的传播效果,“10万以上”、甚至“30万以上”的阅读量统计让之前纸媒评论难以量化的传播效果更为直观可见,而且,快速更新的新媒体平台评论写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禁令的效果,通过时间差争取更大的话语空间<sup>9</sup>。

## (二) 强调评论的专业性,兼有理性、逻辑

评论的专业性是评论员群体建构自身权威的关键,因而,无论是在评奖还是年终总结时刻,“专业”始终被凸显:“在专业的时代,表达也应该更专业”(童大焕),“评论有向专业化解读转变的趋势”(刘远举),“让评论表达的更专业”(杨耕身),“以自己对各种专业知识的把握,为读者提供一张可靠的文化地图”(陈季冰),“新闻评论表达是一个专业的事情”(新浪新闻年度评论)等表述,都体现出评论员群体对“专业”的看重。

但各媒体的评论写作水平参差不齐,评论的专业性不足既是业界反思的对象,也是学界批评的靶子。陈昌凤在参加凤凰网年度评论颁奖时提到,“我想在媒体上找些专业性评论,想要找那种能够真正有一些建设性意见、有一定批评精神的评论,但遗憾的是很少很少”,“这是非常糟糕的地方:我们放弃着专业的判断和把关能力”。

对评论的专业性追求,与评论的专业性不足,实际上是评论生产中长久存在的矛盾。因为每个评论员的能力是有限的,只能在一个或几个领域较为擅长,以这样的知识积累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件,完成日常的评论生产,想要保证每篇评论都专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在评论主体和媒介平台都极大丰富的当下,行业内专业人士的发声很容易在专业性上超过职业的评论员。

评论员们注意到,“在为稻粱谋的职业写作之外,出现了自由撰稿人的评论人群体,他们自然分工,各取自身擅长,往往在专门化评论上多有开拓”(宋志标)<sup>10</sup>,

“更多的专业人士通过微博、微信朋友圈等自媒体参与其中,带来更专业的角度。这都对评论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刘远举),“一桩公共事件的公众解读,以往更多在官方、在传媒,而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与发现,这评说、解读乃至下结论的



主体,无法再被垄断”(萧锐)。

而在评论的专业性之外,理性、逻辑、独到等要求,也是评论员群体对一篇优秀评论的重要评判标准:“有深度、有见解、有逻辑,犀利而理性”(新京报颁奖词);“独到见解”、“有分量”、“看到最深处”(北京青年报颁奖词);“理性、逻辑:不可主题先行,或靠偏见单飞”(张涛甫),“立论理性深入”、“论据充足,论证充分,逻辑严密”(唐远清)等表述,都显示出评论员群体在建构评论专业性方面的积极努力。

### (三) 不拒绝新媒体的评论表达方式,强调引领而非迎合

“在新的媒介空间里,评论形态、生产机理、表达边界发生了新的变化”(张涛甫),“逗逼和卖萌成了主流,大家不喜欢严肃的说教,粉丝数和阅读量最终告诉我们,时评其实是非常小众的读物。它远远比不上段子号,也无法和那些更廉价的心灵鸡汤争短长”(韩福东),这些变化让评论员们意识到,“有效的观点传播,可能需要不得不寻找更恰当的表达方式,比如更诙谐,或者装诙谐”(萧锐)<sup>11</sup>。

但与此同时,评论员群体也拒绝不加区别地迎合新的表达方式,认为“没有必要刻意讨好年轻人,尤其是用一些网络流行词就觉得自己接地气了。也不应该无条件向‘10万以上’的微信文章学习,那是自乱阵脚。评论应该永远做舆论的引领者,而非跟随者”(西坡),同时,对新媒体平台内容生产的浅薄化提出批评,

“在阅读量对写作者的动态影响中,新媒体内容生产会下意识的迎合大众情绪、力图将这种情绪变现,并将严肃论题边缘化”(光明网评论员);“如果写作在网络趣味引导下成了‘为取悦而写’,那如我的某位朋友所说,观点就沦为了智力的健美操,也就不能形成有效的诉求和干预力度”(佘宗明)。

通过对新媒体平台评论风格和内容生产的评价,评论员群体试图树立起与“我者”与“他者”的边界,彰显自身的专业性,并维护权威地位。

### (四) 对评论的社会功能诉求存在价值分野:推动社会还是舆论引导

关于评论价值和社会功能的叙事建构,评论员群体中出现了明显的价值分野,在搜狐评论年终策划中,几位媒体评论员是这样阐释的:“影响时事和推动社会”(曹林),“影响人们的看法,促进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刘远举),“写评论是得有点‘改造社会’的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佘宗明);新浪新闻“2015年度评论”评选也写道,“讲出真话来,这是新闻评论的根本价值所在”。<sup>12</sup>

当然,对评论推动社会的功能的追求是一方面,实际生活中评论能起到的作用

是另一方面,评论员大也都意识到,“评论推动时代进步,是个漫长的过程,艰难的过程”(刘雪松),“真话仍是稀缺资源,启蒙远未完成”(新浪新闻),特别是“太多的坏消息接踵出现,有时难免怀疑评论的力量。我们的声音真会被所他人听到,或者稍稍推动社会的进步吗?答案常常令人沮丧”(王聃)。

这里需要特别引入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2015年7月在由该社主办的首届党报评论融合发展论坛上的讲话,以此对比党报和市场化媒体中的评论人对评论功能的不同追求。杨振武提到,“作为主流媒体的灵魂和旗帜,党报评论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多元价值中确立主导,在与公众的交流对话中凝聚共识,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评论作为观点的传播,不能只是表态、宣示,也要有对话、引领的能力”,要“入耳入脑的有效传播”,“党报评论要确立解释权、话语权、引领权,更需要在不同群体、不同对象中夯实推进共识的基础”<sup>13</sup>。

从中可以看出,党报评论人更为看重评论的政治效果,即所谓的“用传播效果体现政治立场”,虽然落脚点也强调“推进共识”,但前提是党报评论要确立“引领权”,暗含以党报评论“定调”之意。与之相呼应的,是新华社评论员丁永勋在获奖感言<sup>14</sup>中说,“在一个关键点上,通过新华社这个平台发声,真正起到了舆论引导作用”。

不可否认,党媒对评论“引领”、“引导”舆论的功能追求,与市场化媒体对评论“推动社会”、“改造社会”的功能追求,在某些时刻存在交叉重合,但根本上,评论作为说理的文字,评论者本人应该存在被说服的可能性,心怀谦卑,如果评论从发表那一刻起就承担“舆论引导”的责任、不可被说服的话,恐怕就很难起到在不同群体中推进共识的作用。另外比较有趣的一点对比是,市场化媒体评论员虽然怀抱以评论“推动社会”的野心,但很多时候对评论能有多大的作用是怀疑和沮丧的,而党报评论员却对党报评论有较强的自信,认为“党报评论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拿的是一只音量最大的金话筒”。

#### 四、小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2015年多家媒体推出的年度新闻评论评选及其颁奖辞、岁末年初的评论策划,以及部分知名评论员在个人微信公众号撰写的年终总结等文本展开分析,探讨评论员群体在“热点时刻”的阐释实践。

研究发现,在阐释评论空间与言论表达之间的矛盾时,评论员大都抱怨言论环境的逼仄影响了评论写作,相应的,媒体的评论奖项会特别褒扬那些突破话语禁区

的文章。这期间值得注意的一个新现象是，导致言论空间逼仄的不仅仅是官方和媒体机构，部分普通网友的反馈也对评论员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建构新媒体平台上的评论标准时，评论员群体主要从时效、专业、表达、功能四个维度来谈：一是追求评论的时效性，以速度PK尺度；二是强调评论的专业性，兼有理性、逻辑；三是不拒绝新媒体的评论表达方式，强调引领而非迎合；四是对评论的社会功能存在价值分野，“推动社会”还是“舆论引导”成为市场化媒体评论员与党报评论员对评论功能的不同追求。

而在上述两个层面的叙事之外，对于评论员群体的叙事建构，勾勒出评论员群体规模扩大、边界模糊的特征，以及评论员群体在新旧媒体之间、党媒与市场化媒体之间的内部分歧。

新媒体平台极大丰富了评论主体，特别是传统的职业评论人意识到，那些伴随新媒体平台出现的自由撰稿人往往话语空间更大，进而更容易获得影响力，评论员王攀认为，“新媒体闯红灯的成本比较小，大不了删文，删号，另开一个就是了。但传统媒体和媒体人试试，多少人的饭碗”，对一个评论员来说，不想因为言论而影响事业，“很难”。此外，党媒与市场化媒体之间的分歧也愈发明显。在党报评论员的话语体系中，“共同体”往往限定为“各家党报”，是以媒体机构的性质来划分的，与市场化媒体评论员基本没有交集。如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提出，“增强‘共同体意识’，在观点竞争中打造评论国家队”，“各家党报应该也有必要成为一个‘话语共同体’”。可以说，因为言论尺度而导致的传统媒体机构评论员与自媒体评论员的差异，和因为媒体机构性质而导致的党媒评论员与市场化媒体评论员的差异，影响着评论员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共同体构建。

尽管“阐释社群”理论已被大量用于研究，仍有批评者认为，Fish从未清晰地界定过阐释社群的定义，也没有解释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辨认其成员；Fish忽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想当然地认为一个阐释社群内部的成员自然采用同样的阐释策略、共享同样的观点，而不承认一个人可能属于多个阐释社群，忽略了社群内部冲突(Marianne,2000; Spaak,2008)。

但也有辩护声音认为，Fish对“阐释社群”的概念本来定义得就是比较狭窄的，他只对不同形式的学术类文学批评感兴趣。对他而言，阐释社群是由联系得比较松散的文化学者群体组成的，这些学者对于文学的本质、文化批评的目的、阐释过程的本质都有基本的共识(Radway,1985)。而且，尽管“阐释社群”概念比较模糊，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共识：阐释社群是由一系列阐释

策略构成的；有些阐释社群是公开的、自我意识到的、比较稳定的，而有些阐释社群则不那么明显；阐释社群是复杂的、重叠的且潜在冲突的(Lindlof,2002)。

研究发现，阐释社群要想有效运作的话，应是一个相对弱联系的社群，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挑战，不会对新思想的流通制造太多障碍(Cornford, Wilson & Richardson,2013)。这对于分析新媒体语境下评论员阐释社群的流动与发展有着重要启示：一方面，对意义的争夺，是阐释社群内部及不同阐释社群之间持续进行的行为，关于新闻评论的专业标准、环境感知的判断势必处于不断地建构和流动中；另一方面，评论员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外部边界的拓展，也会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检讨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展望后续研究的方向：

其一，文章虽然较有创新性地将“阐释社群”这一理论框架用于评论员群体，及时关注到新媒体语境下评论员群体对于评论环境、专业标准及共同体建构方面的最新变化，但用于分析的文本在历时性方面还有所欠缺，也就是说，本研究以2015年的奖项评选和年末评论总结为主，没有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进行比较分析。Zelizer(1993)指出，记者们使用话语去谈论、时而挑战新闻生产实践中已形成的共识，让自己更好地适应变化的技术、环境和新闻业的地位。因此，后续研究有必要关注不断变化的新闻环境，以及伴随环境而产生的话语实践，特别是在重大事件或节日等“热点时刻”评论员群体的话语实践，分析其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不断建构、维护专业标准，进而与之前研究做对比。

其二，文章搜集的文本以市场化媒体评论员的阐释实践为主，党报评论员的文本较少，这固然与党报评论员较少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开阐释有关，但今后可以尝试通过其他渠道多方搜集，进一步研究评论员群体内部的差异。

(责任编辑：陈曦)

### 注释 [Notes]

1. 参见陈敏，《媒体融合背景下中国新闻评论之变——以17家媒体评论人访谈为基础的研究》，《新闻记者》，2015年第5期，36-42。
2. 《那些转行的评论猿，都在干神马？》，微信公众号“红网红辣椒评论”，2015年7月8日。
3. 参见“搜狐评论年终策划”十三篇，2015年12月15日—31日于微信公众号“有狐”陆续推出。
4. 参见凤凰网和阿里巴巴集团主办的“2015年度影响中国的十大评论”评选，“2015新浪新闻年度评论”评选，《新京报》2015年度新闻奖评选，《北京青年报》2015年度总结暨总编辑特别奖评选，以及2015年8月举办的第十届红网“红辣椒评论”佳作颁奖暨时评研讨会。
5. 参见“搜狐评论年终策划”十三篇，2015年12月15日—31日于微信公众号“有狐”陆续推出。

6. 参见2016年1月1日—2日,评论员王攀、王琳分别在个人微信公众号“攀谈天下”、“天涯法律评论”上发表的感怀文章,以及2015年5、6月间,评论员萧锐、程仕才(笔名西坡)在微信公众号被封、重开公号时的感言。
7. 詹万承,《徐徐达内》,微信公众号“媒体札记”,2015年9月7日。
8. 西坡,《有人负责死亡,有人负责歌唱》,微信公众号“毒舌的舌”,2015年6月11日。
9. 《五问天津爆炸》一文后被删除。
10. 李华锦、陈剑虹,《宋志标在生活1访问》,微信公众号“师大青年”,2015年12月11日。
11. 不瘦兄,《新号开张启事》,微信公众号“不瘦兄说”,2015年5月17日。
12. 《讲出真话来,新浪新闻评出2015年度评论》,新浪新闻,2015年12月30日, <http://yd.sina.cn/article/xinzhi/2015-12-30/xinzhi-ixmxxsp7325568.d.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13. 杨振武,《人民日报社长纵论党报评论融合发展》,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2015年7月10日。
14. 丁永勋的评论文章《真相别总靠“倒逼”》获凤凰网“2015年度影响中国的十大评论”之二。

###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白红义(2014).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 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国际新闻界》,(6),46-60.
- [Bai, Hongyi(2014).Journalistic authority, occupational ido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 study on the memorializing discourse of Jiang Yiping's retir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6),46-60.]
- 陈楚洁,袁梦倩(2014).新闻社群的专业主义话语: 一种边界工作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5),55-69, 127.
- [Chen, Chujie & Yuan, Mengqian(2014).Discourse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mong the Chinese journalistic community: A boundary-work perspective.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5),55-69, 127.]
- 丁方舟(2015).“理想”与“新媒体”: 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3),6-22.
- [Ding, Fangzhou(2015)."Ideal" and "new media":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and power in Chinese journalistic community.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3),6-22.]
- 丁方舟,韦路(2014).社会化媒体时代中国新闻人的职业困境: 基于2010—2014年“记者节”新闻人微博职业话语变迁的考察.《新闻记者》,(12),3-9.
- [Ding, Fangzhou & Wei, Lu(2014).Chinese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ism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A research of changes of journalists' Weibo discourses on journalist's day (2010-2014). *Journalism Review*,(12),3-9.]
- 黄顺铭(2014).作为一种话语的颁奖词——对于普利策新闻奖(1917-2014)的个案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48-58.

- [Huang, Shunming(2014).Citation as a discourse: A case study of the Pulitzer Prize in Journalism(1917-2014).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48-58.]
- 金叶(2015).社会化媒体语境下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困境与重构.《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54-159.
- [Jin, Ye(2015).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dilemmas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under social media challenges.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4),154-159.]
- 李红涛,黄顺铭(2014).谋道亦谋食:《南方传媒研究》与实践性新闻专业主义.《当代传播》,(4),16-19.
- [Li, Hongtao & Huang, Shunming(2014).Construcing an interpretive community: Southern Media Research and the Practice-oriented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Morden Communication*, (4),16-19.]
- 张志安,甘晨(2014).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界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55-77, 127.
- [Zhian, Zhang & Chen, Gan(2014).A case study on the Event of Sun Zhig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memory: As a discourse community of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sociology.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55-77, 127.]
- Berkowitz, D. & TerKeurst, J. V. (1999).Community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y: Rethinking the journalist-source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9 (3), 125-136.
- Brewin, M. (1999).The interpretive community and reform: Public journalism plays out in north Carolin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3 (3), 222-238.
- Carleton, G. (1995).The figure of the mass reader in early soviet literature: Artificial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and critical practic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2 (1), 1-22.
- Cornford, J., Wilson, R. Baines S. & Richardson, R. (2013).Loc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information ecology: The challenge of building interpretative communities.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 33 (3), 201-208.
- Golden, J. M. (2008).Construing patent claims according to their interpretive community: A call for an attorney-plus-artisan perspective.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21 (2), 321-386.
- Goldsmith, A. (1998). is there any backbone in this fish? -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social criticism, and transgressive legal practice. *Law and Social Inquiry*, 23 (2), 373-428.
- Gutsche, R. E. Jr. (2014).News place-making: Applying "mental mapping" to explore the journalistic interpretive community. *Visual Communication*, 13 (4), 487-510.
- Hermes, J. & Stello, C. (2000).Cultural citizenship and crime fiction: Politics and the interpretive commun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3 (2), 215-232.
- Lindlof, T. R. (2002).Interpretive community: An approach to media and religion. *Journal of Media and Religion*, 1 (1), 61-74.



- Marianne, S. (2000).Language is not life: The chain enterprise,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and the Dworkin/Fish Debate. *Connecticut Law Review*, 33, 1099-1139.
- Mitra, R. (2010).Resisting the spectacle of pride: Queer Indian blogger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54 (1), 163-178.
- Radway, J. (1985).Variable literacies and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The functions of romance reading.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5, 337-361.
- Rauch, J. (2007).Activ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Rituals of consumption and interaction in an alternative media audienc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9 (6), 994-1013.
- Robel, L. (2001).The practice of precedent: Anastasoff, noncitation rules, and the meaning of precedent in an interpretive community. *Indiana Law Review*, 35, 399-422.
- Spaak, T. (2008).Relativism in legal thinking: Stanley fish and the concept of an interpretative community. *Ratio Juris*, 21 (1), 157-171.
- Wenner, L. A. (1993).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quake: The redefinition of fan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y in sportswriting about the 1989 Bay Area World Series and earthquake disaster. *Journal of Sport & Social Issues*, 17 (3), 181-205.
- Zelizer, B. (1993).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0 (3), 219-237.